抗战烽火中诞生的期刊——《调查研究》

□ 郑学富

《调查研究》的主编张衡宇,1907年出生于山西省忻县。他于1928年考进北平师范大学,在课余时间,他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列著作,系统钻研革命理论,加入进步的革命组织。1931年大学毕业后,在中共地下党员肖镇青的引荐下,前往河北大名七师任教,不久又转到太原成成中学任教。1933年,张衡宇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2月,由于党组织遭到破坏,张衡宇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宁死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他与狱中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通过看守人员搞到了不少外文马列著作,翻译成中文,向狱友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营救,张衡宇出狱。党组织先后安排他到北方局军委、晋西南第六专署、北方局党校等单位工作。1941年,北方局调查研究室成立,张衡宇又任研究室秘书主任。他经常在《党的生活》《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调研文章,对太行山区根据地建设提出有益的建议。在创办《调查研究》工作中,他深入到基层、各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略论调查工作》。他提出了调查工作中的态度与方法:首先要做到"勤",即腿勤、嘴勤、手勤;其次要做到"钻",要在问题里边追问题,要具有"打破沙缸问到底"的精神;再次是要注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要求具有改造的精神。他还提出在调研中应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首先是选择调研对象问题;其次是接近群众问题;第三是调查者的政治面貌问题。他还撰写了调研文章《妇女与婚姻》,一同发表在创刊号上。

编辑杨公素,原名余贻泽,1910年出生于重庆大宁,1928年春,进东吴大学附中,1931年在东吴大学政治系学习,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研究院。他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党第39军做地下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员、八路军总部秘书。他撰写了调研文章《敌寇在华北所实行的经济统制》。

编辑郑思远,1914年生于山西省襄陵县,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9月起历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国民教育科科长,北方局党校教育科科长,北方局社会部整风研究室主任。他撰写了《敌占区谁们发了财——太南潞城县xx村的调查》。

中共中央北方局青年运动委员会也非常支持编辑部的工作,撰写了《青年工作调查研究提纲》发表在创刊号上。还刊登了《晋察冀北岳区农村经济与阶级关系的变动——节录林铁同志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北岳区党委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对敌货币斗争的几点经验》等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涉及一些调查研究方法以及重要的战争、经济调查报告,不仅为当时人们了解相关信息提供了帮助,并且对于党内一些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帮助,促使根据地出现了实事求是的调研之风。

《调查研究》还专门设立了"广播室"栏目,专为反映各地调查研究工作状况与交流各地工作经验。该栏目报道了晋察冀、山东、晋西北、晋冀豫、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地的调查研究工作。报道说:自从中央发布《决定》后,已在华北全党引起相当注意,各地区的调查研究组织都已先后建立起来,开始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与研究。在报道各地调研工作中,编辑部实事求是,并不是一味地唱赞歌,而是毫不留情地指出存在的问题。

创刊号成为永恒的记忆

日军为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及第129师主力,并策应其对冀中区的"扫荡",于1942年5月中旬开始,以其第1军3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法,分三期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夏季"扫荡"。5月15日,日军开始第一期"扫荡",以7000余人兵力奔袭太岳南部沁河沿岸东域、马壁地区的八路军第386旅,同时完成了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的合围。5月24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对合围圈内的八路军展开攻击,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分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张衡宇与《调查研究》编辑部的同事将所有重要文件和调查材料带好,在晚上趁黑夜突围。张衡宇突围出来后,发现身边的勤务员受伤没有突围出来,他不顾个人安危,绕路几十里终于找到勤务员。天渐渐亮了,突然遭遇搜山的日军。他将勤务员隐蔽起来,掏出手枪向日军射击,引开日军。敌人发现他后,一齐向他射击,张衡宇不幸中弹,长眠于辽县的大山中,年仅35岁。在突围过程中,张友清将自己的马让给一位女同志,在与日军战斗中被捕,被押送到"太原工程队"集中营。在狱中,张友清受尽敌人摧残。1942年7月7日,张友清牺牲于太原集中营。

太行、太岳军民在此次反"扫荡"战役中,共歼敌3000余人,打破了日军的企图,坚持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待形势稳定后,彭德怀便着手恢复调查研究室、复刊《调查研究》。可是由于研究室人员在突围中大多牺牲,缺少编辑和调研人员,印刷设备也遭到损坏,尽管后来油印了几期业务研究材料《调查研究》,但正式的红色期刊《调查研究》最终没能复刊,创刊号也成了终刊号,给后人留下了永远的红色记忆。《调查研究》虽然只出版一期,但是促进了调查研究之风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蓬勃兴起,一直传承至今,对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连载三·全文完)

延安无线电材料厂的工人生产急需的广播器材

党的红色电波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声音

□ 钱国宏

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编辑、播音、技术工作都由新华社负责,稿件由新华社广播科提供。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设在延安清凉山,播音室设在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土窑洞里。播音室没有隔音设备,为了减少杂音,就将边区生产的粗羊毛毯子挂在门口和墙上;没有报时器,就用筷子敲瓷碗发出"铛、铛"的声音;没有降温设备,就在窑洞墙壁上凿方槽填冰块;土法发电电压不稳,影响到功率输出不稳,大家就采取人工调压……有关资料总结说:"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的全部财产只有3/4的方桌和3/4的油灯!"为提高新闻时效,编辑们常常夜间编稿,第二天由通讯员送到19公里外的王皮湾录音、播出。清凉山到王皮湾中间隔着一条河,夏天,遇到山洪暴发,通讯员只有将广播稿用油布包好,顶在头顶泅水过河。冬天,延安的气温会降到零下近30℃,很多同志的手都生了冻疮。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新华广播电台的同志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声音传到了全国各地。

新华广播电台最初每天播音1次2小时,后来增至每天2次3小时和3次4小时。广播内容多是国内国际新闻、抗战消息、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名人讲演、科学常识、革命故事、音乐戏曲等。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清脆嘹亮,打破了国民党和日伪对我们党的新闻封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沦陷区之间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成为我们党"与敌伪展开空中宣传战"的最重要武器,被誉为"黑夜里的一盏明灯"。1941年夏天,毛泽东听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有一台手摇唱机,但没有唱片,就将自己保存的20多张送给新华广播电台办起了文艺节目,并叮嘱要认真把广播办好。

1941年1月下旬,新华广播电台播出了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1941年3月到7月,国民党布置河南广播电台"就近干扰",还指派中统、军统特务侦察新华广播电台台址以便进行破坏。1941年12月3日,新华广播电台开设了日语节目,广播对象是侵华日军,创建了中国人民的对外广播事业。

红色电波不曾喑哑

1943年春,因电子设备故障,新华广播电台被迫暂停播音。1945年8月中旬,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这一天播出的是朱德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的对日寇全面大反攻的进军命令。

1947年3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新华广播电台在14日播完当天中午的节目后,秘密转移到子长县(瓦窑堡)的山沟里继续播音,并于1947年3月21日起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此后曾先后转移到太行山麓(今河北省涉县境内)、滹沱河畔(今河北省平山县境内)播音。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一直没有中断,党中央的声音飞越万水千山,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大鼓舞。随着国内形势的转变,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立足解放区,面向全中国,以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军队官兵为主要宣传对象。广播内容紧密配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势的发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节目以新闻和评论为主,先后办有"解放区介绍""人民呼声"和"对国民党军广播"等专题节目。据记载,沦陷区和国统区有数十万台收音机能收听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当时曾接到从北平、南京、昆明、重庆等地带到延安的信。1946年6月,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听了延安新华广播,对共产党、对民族解放有了更多了解,驾驶飞机起义,投向光明。更有不少收听了陕北新华广播的国统区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走上了抗日前线。

1946年7月29日,新华广播电台用广东话、闽南话和国语第一次对华侨播音,播出了延安归国华侨联合会书记王唯真揭露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阴谋的《告侨胞书》,使华侨中很多人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有了客观正确的认识。1946年10月13日,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在新华广播电台发表《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广播讲演,痛斥了蒋介石发动内战,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行。1946年10月20日,新华广播电台播出了美国人马海德《为着美国人的利益,应该撤退驻华美军》的讲演词,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大举进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敌人重点轰炸的目标之一。

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进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同年12月5日,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为国家广播电台。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培养出人民广播的第一批编辑、播音员和技术人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台工作,通过无线电播送国内国际新闻及抗战消息、中共中央重要文件等,打破了国民党和日伪的新闻封锁,打开了我党我军向世界宣传的窗口,向世界发出站起来的新中国强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连载二·全文完)

·甘肃人物·

唐襄乐县尉张文成和他的《游仙窟》

□ 李 青

有这样一部与庆阳有关的传奇小说,在国内失传上千年,却在日本风靡千余年,并深刻影响了日本文学史。这本书就是初唐传奇小说《游仙窟》,说它和庆阳有关,是因为日本所存多个版本的《游仙窟》都有"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的题记。

宁州襄乐,即今天的庆阳市宁县湘乐镇,古襄乐从西汉设县到元代撤县,是陇东历史上设县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千年古县之一。襄乐最早叫"襄洛",因其东依子午岭,气候温和、水资源丰富,秦汉时,这里就是农业文明的重要区域。襄洛向南又可直达关中,也是重要的交通和军事要地,因而在动荡的南北朝,襄洛的地位更加重要,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其更名为"襄乐",不久又撤县设郡。西魏时襄乐郡又成了燕州的治所,还在襄乐筑城称燕州城,后周时才撤燕州和襄乐郡重又改为襄乐县。唐朝时,襄乐属于地位较高的"紧"县,直到宋代,随着政治中心的南迁,襄乐的地位逐渐下降,到元代至元七年(1271年),襄乐县制才被废止并入宁州。

张文成,本名张鷟,号浮休子,深州陆泽县(今河北省深州市)人,唐仪凤二年(677年),青年张文成参加"下笔成章科"制举考试,中举后被授任宁州襄乐县尉。第二年吐蕃入侵,朝廷招募人员从军阻击,襄乐县尉张文成应召前往河源(今青海黄河源头地区)。《游仙窟》就是他在河源期间创作的,小说用第一人称自序在奉使河源的途中,在金城(兰州)附近的积石山(临夏小积石山),投宿"神仙窟"(炳灵寺),遇到了女主人崔十娘和五嫂,于是饮宴欢笑,吟诗酬答,极尽欢愉后离去,故事全篇仅八千余字,叙事以骈文为主、夹杂大量诗歌和散叙,形成独特的散韵结合体制。全篇包含了84首诗歌,文辞绚丽、对仗工整,声韵优美、起承转合自然流畅,人物形象生动传神,遣词造句极富想象力和表现力。

张文成出生在一个文学世家,从他爷爷到玄孙,每代都以科举入仕做官,虽官都不大但都擅长文辞,他和孙子、玄孙都有著作传世。其中才名最盛的当属张文成。在以科举取仕的唐代,唐人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来比喻中举的难度。但张文成弱冠之年就进士及第,此后,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他七次参加皇帝主持的制举考试,四次参加吏部铨选,不但全部通过且排名靠前,难怪主考官称:"张子之文如青铜钱,万拣万中"。张文成因而得了个"青钱学士"的雅号。

如此顺风顺水的科举之路,并没有成就平步青云的仕途。仕途不顺的张文成才名却极盛。《旧唐书》记载张文成"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而且新罗、日本及东夷诸蕃国,尤其喜欢他的文字,每次派遣使者入朝,都愿意出重金购买张文成的作品。

《游仙窟》在国内失传,这跟作者和作品都有关系,史书记载张文成"性情偏激急躁,傥荡无检,傲慢轻狂、不持士行",尤其被那些正人端士所厌恶,比如三朝元老姚崇就很讨厌他。他的成名作《游仙窟》诞生时,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当时的人对小说中人称、情节皆可虚构还没有足够认知。张文成在国内流传的作品只有两部,《龙筋凤髓判》是中国迄今为止完整传世的最早的一部官定判例,在法律史和文学史上都有重要价值,被收入《四库全书》。另一部笔记小说《朝野佥载》,《太平广记》和《资治通鉴》都有收编。

张文成还是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墙内开花墙外红"的文人。日本流传的《游仙窟》文本众多,古本有古抄本、篆刻本、古刊本,又有无注本、有注本,还有多个近现代译本,古今时间跨度千余年。有古注本对卷首"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的题记中"宁州"的注释为"属关内道,在去京三百里西北也"。日本人整理编著的各种汉文集中,把《游仙窟》同《诗经》《论语》《山海经》等作为汉文经典一并收入。日本最早编著的《全唐诗逸》就选取了《游仙窟》中的19首诗,后来补编时,又录入了58首,足见日本人对《游仙窟》的重视和喜爱。日本古典文学最高成就《源氏物语》就多次引用、化用《游仙窟》文辞。日本古典诗歌总集《万叶集》中有多首文辞与《游仙窟》雷同。日本学者对《游仙窟》的研究著述,有阐释《游仙窟》对日本古代说话文学、万叶和歌、物语文学、近世小说的重要影响的,有考证《游仙窟》同日本文字类书、注释类书、随笔类书关系的等等,文献丰富,成果丰硕。

新、旧《唐书》没有为张文成立传,只在其孙子"张荐传"中简单附带几句,生平经历和生卒年月均未表其详。唐末学者莫休符在风物志《桂林风土记》中对曾流放桂林的张文成生平有略述。从唐朝到民国,国内没有文学或史学著作专门研究张文成其人其著,大多只是在收编文集时收录了他的一部分作品,有的附带几句作者简介。直到清朝末年,驻日公使杨守敬在日本访书时,将《游仙窟》收录于光绪十年刊出的《日本访书志》。

1922年,鲁迅得到日本元禄三年的《游仙窟钞》,在北京大学讲学时介绍了这部作品,并在著《中国小说史略》中讲到《游仙窟》时说"中国久失传,后人亦不复效其体制",因而才引起了一些国内学者的关注。在鲁迅的鼓励和帮助下,鲁迅的朋友、时任《民国日报》编辑的章廷谦(笔名川岛),以鲁迅收藏的钞本为蓝本,核校并加注标点,1929年2月,由鲁迅作序,北新书局出版了最早的《游仙窟》点校本。鲁迅在序言中说,《游仙窟》对研究唐代的社会风尚,流行俗语等都可作史料佐证,至于用骈体文创作传奇小说,《游仙窟》要比清代陈球之的《燕山外史》早千年左右,因此,对研究文学史来说,不可或缺。

·丝路览胜·

茶马古道上的陇南名镇

□ 曹鹏雁

徽县伏家镇

徽县伏家镇位于徽县城西15千米处,汉、唐、北宋为下辩、同谷、栗亭辖地,先后有汉栗亭、唐栗亭镇、宋栗亭县之名。地名来历说法有二:其一,因镇北有创建于北魏,繁盛于宋、元时代的紫荆山北禅寺,山下河川地带人口聚居而得名"佛家镇",后衍名为"伏家镇"。其二,元代初年设栗亭管民司,为巩昌府元帅汪世显封地,或易名福镇,后转音为伏家镇而得名。元代至元后划归徽州(县)。明清时为镇,民国时称伏镇镇公所。1949年12月后设立伏家镇乡公所。1954年设立伏家镇人民公社。1979年设立伏家镇乡人民政府。1989年设立伏家镇人民政府。辖伏家镇社区1个居民委员会,伏镇、前进、峡门、豆坪、河湾、架山、贺店、竹林、索罗、郭庄、西沟、西厢、李窑、李庄、中坝、山庄16个村民委员会,98个村民小组。镇人民政府驻伏家镇北街。

镇中河流纵贯南北栗亭川,有"仇鸠水、紫金水"等古名。地处徽成盆地腹部,地势中部、南部低,东、北、西三面高。地形河谷平坦开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灌溉便利,气候温和。镇北有316国道线通过,镇南"十天"高速支线通往金徽酒厂区,支旗—伏家镇公路贯通东西。

多汉代墓葬,出土多汉陶、宋瓷等文物,遗留有北禅寺、云烟峡、杨难当墓、明代骆坝川郭从道家族先茔、杨将军祠、杨公墓志、泰山庙、关帝庙、魏氏夫人节孝碑等遗迹。**(连载十)**